

历史节点

光绪二十四年

变政与政变

董丛林 著

故宫出版社





光绪二十四年
变政与政变

董丛林 著



故宫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变政与政变：光绪二十四年 / 董丛林著. — 北京：
故宫出版社，2013.6
（历史节点）
ISBN 978-7-5134-0393-1

I. ① 变… II. ① 董… III. ① 戊戌变法—通俗读物
IV. ① K256.5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60814 号

变政与政变 —— 光绪二十四年

著 者：董丛林

责任编辑：冯印淙 王志伟

装帧设计：王 梓

出版发行：故宫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：100009

电话：010-85007808 010-85007816 传真：010-65129479

网址：www.culturefc.cn 邮箱：ggcb@culturefc.cn

印 刷：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：13

字 数：200千字

版 次：2013年6月第1版

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~5000册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34-0393-1

定 价：26.00元

目 录

代引言 题解短语

上篇 变政的前奏

一 西花厅里的亮相.....008

二 紧锣密鼓策“圣主”.....018

三 “分割洊至”的危迫.....028

四 “会为保国，岂不甚善”..038

五 京城之外的激荡.....047

六 诡譎微妙宫廷间.....059

中篇 不寻常的“百日”

一 颁诏定国是.....071

二 一日之间.....078

三 终于见到了天颜.....087

四 新政舞步疾.....096

五 动真格的？.....106

六 文韬武略皆失灵.....115

七 几多疑案几多谜.....129

八 关此东洋客乎？.....138

下篇 政变的劫难

一 悲哉，瀛台囚！.....151

二 缙骑苍黄遍九关.....159

三 我自横刀向天笑.....168

四 “兴革悉反之”？.....178

五 没有结成的联盟.....187

六 成败得失怎评说.....196

尾声 怪圈不怪.....204

后记.....207



光绪二十四年
变政与政变

董丛林 著

故 宫 出 版 社

目录

代引言 题解短语

| 上篇 变政的前奏 |

- 一 西花厅里的亮相.....008
- 二 紧锣密鼓策“圣主”.....018
- 三 “分割存至”的危迫.....028
- 四 “会为保国，岂不甚善”.....038
- 五 京城之外的激荡.....047
- 六 诡譎微妙宫廷间.....059

| 中篇 不寻常的“百日” |

- 一 颁诏定国是.....071
- 二 一日之间.....078
- 三 终于见到了天颜.....087
- 四 新政舞步疾.....096
- 五 动真格的？.....106
- 六 文韬武略皆失灵.....115
- 七 几多疑案几多谜.....129
- 八 关此东洋客乎？.....138

| 下篇 政变的劫难 |

- 一 悲哉，瀛台囚！.....151
- 二 缙骑苍黄遍九关.....159
- 三 我自横刀向天笑.....168
- 四 “兴革悉反之”？.....178
- 五 没有结成的联盟.....187
- 六 成败得失怎评说.....196

尾声 怪圈不怪.....204

后记.....207

代引言 题解短语

赠君一法决狐疑，不用钻龟与祝蓍。

试玉要烧三日满，辨才须待七年期。

——白居易诗句

在中国近代历史上，光绪二十四年（戊戌，1898年）无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，而其重要和复杂的历史内容，用“变政与政变”来概括也许可以说得上提纲挈领，故曾取作原版书名。

“变政”作为“变法”的同义词，今天说来听来似乎不如后者顺口顺耳，但它也确是当年习用的词语，譬如说它出自维新派领袖和骨干人物口中笔下的频度就是相当高的，康有为就曾以“百日变政，万汇昭苏”来概括我们通常所说“百日维新”之时的宏观情势，分明是以“变政”来指称当时的维新变法，不能不谓典型。可知该词决非笔者为求与“政变”字序上的正反对应而牵强拼造。

“变政”与“政变”，这文字形式上有着自然天成巧对妙趣的两者，其所连缀的特定历史内容，则如一出戏中喜悲迥异、相反相成的前后两幕，展开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中的一个曲折片断，又凝成蕴涵丰富而深刻的一个历史组结，牵缠着时人和后世从未间断地探赜索隐。

于今，距那个不寻常的年头已经一百一十多年。百余年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，然而，对于华夏神州来说，这百年来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。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，来鸟瞰那场历史风雨的陈迹，从中剥绎和领悟鲜活的启示意蕴。

这首先需要让那段历史在我们的心目中“复活”。“复活”的历史才不

再是干瘪的木乃伊，而重新有了灵魂，有了血肉，有了动的场景，有了活的画面。当然，受史料遗存状况等客观条件和我们主观认识条件的双重制约，这种“复活”不可能是“复原”——既不可能“复活”其“全部”而只能是“局部”，也不可能“复活”得绝对“真实”而只可能相对“近似”，并且还不免有解不开的疑窦，破不了的谜氛。本书便是对那段历史作个如此情形的“聚焦”。

这种“聚焦”所显示的，当然不是现场的写生，而是对异境的体察，往时的追溯；也不是成象的机械描摹，而是今人与历史沟通意境上的写真，离不开以我们的理念去撞击那面历史回音壁的反弹。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——克罗齐（B. Croce）的这句名言可谓从一个特定角度揭示了“历史”的本质属性。本书对当年“变政与政变”历史的“聚焦”，当然也超越不了这一铁定法则。

至此，务虚性的题解话语已该打住，还是把思考和品评多留给尊敬的读者。

上 篇

变政的前奏

面对“外衅危迫，分割洵至”的严峻形势，以救亡为直接触发点，康有为辈开始掀动新一轮维新高潮。已不只限于舆论宣传和在野策动，也不仅仅与某些帝党官员连鑣并轡，他们开始引起光绪皇帝的注意和借重，一个前所未有的“神圣同盟”开始形成。与京城的漩涡中心相应和，一些地方也波涛激荡。然而，宫闱内外，被复杂的派系网络牵缠，形势诡譎叵测。

一 西花厅里的亮相

戊戌大年初三（1898年1月24日），京城里依然弥漫着一派浓烈的节日气氛。总理衙门的西花厅却无缘再享休闲的宁静，在这里，几个“大臣”与一个“小臣”正在进行着绝不轻松的问对论政。

在场的“大臣”为翁同龢、李鸿章、荣禄、廖寿恒、张荫桓五人。虽说他们也是地位高下不等，权势轻重有差，但都是总理衙门大臣，起码官至部堂、疆吏，别说更有人充任军机，荣列相国，贵为帝傅。岁数上，长者早已年逾古稀，最小者也正当花甲。相比之下，不论是官职地位还是年齿，这个“小臣”之“小”，确乎名副其实——他，康有为，中进士尚不满三载，授区区六品工部主事亦未实就，一介“游士”而已，年方四十有一（按当时通行虚岁计，下同）。那么，如此一位“小臣”，怎地和一班“大臣”坐到了一起谈论朝政国事？

别看康有为在朝臣中数小字辈，但对于方兴未艾的维新运动来说，堪称能呼风唤雨的大师。在维新之路上，他已经进行了多年求索，留下了一行清晰的足迹，一直连通到这眼下的西花厅里。

这个于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出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下一个士大夫家庭，自幼领受传统教育，博得“圣人为”绰号的士子，在二十多岁上有了游观香港、亲身接触资本主义文明的经历之后，开始着意探研西学，通过中西比较寻求救国强国之道，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。

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，他利用在京第二次参加顺天乡试（第一次是在光绪八年即1882年）的机会，曾单骑出居庸关，至八达岭，登上万里长城，居高极望，大有“山河人民之感”，思及自中法战争以后，国势日蹙，

若及时变法，或犹可支持，否则拖延下去，错过时机，再欲为之，势必无及，于是“发愤上书万言，极言时危，请及时变法”。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上皇帝书，向当政者发出了“变成法”、“通下情”、“慎左右”的呼吁。在当时大多朝士的心目中，像康有为这样一个无名鼠辈，竟然要上书皇上指论国政，简直是迷狂之至，对他极尽嘲讽攻讦之能事，哪里还愿意为之代递上书。倒也有几个想帮忙的臣工，但权能有限，再加上阴差阳错的一些不利之事的凑合，书并未能上达，还连累得考试成绩本不错的他此科名落孙山。康有为的心头自然充满了遗憾和悲愤，他赋诗抒怀：

沧海飞波百怪横，唐衢痛哭万人惊。

高峰突出诸山妒，上帝无言百鬼狞。

岂有汉廷思贾谊，拼教江夏杀祢衡。

陆沉预为中原叹，他日应思鲁二生。

显然，康有为也不失自负：他自觉得是突出于“诸山”的“高峰”，是怀才不遇遭受迫害的杰士，同时更是蓄志来日能救国济世的圣手。但无论如何，眼下他在京城里是百般窘困，没有一点儿用武之地了，只好回到南粤家乡谋图秣马厉兵。

他做不了“山大王”。他最得心应手的“兵器”是一管狼毫。与之相辅相助，还有他的一张利口。当然，指挥他这管笔和这张口的，是他那一刻也安顿不了并且最擅长异想天开的头脑。这些也许就是他的全部本钱？噢，也不要忽略，除此而外，康有为这时还具备了另一种无形资本，那就是他惊世骇俗的上书之举所造就的“名气”。尽管在“常人”的心目中，他所出的不过是“狂名”、“恶名”甚至“骂名”，但这也已足以使他显示出“非常”。非常之人自有非常之人的理解、敬慕和追随。于是，他的门下，水到渠成地逐渐聚合起一群志同道合的弟子。这就是康有为“羊城（广州）设馆”，更通常是说“万木草堂”讲学的由来。如果说其正式发端是以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在长兴里开馆为标志，那么在这前一年，即有了陈千秋和梁启

超相继向康氏拜师从学的先导。

“南洲讲学开新派，万木森森一草堂。”的确，康有为所开设的，决不是一所普通学馆，而是编织了一只造就维新人才的摇篮；康有为所充当的，也决不是一名仅在学事上解惑授业的教书先生，而更是在思想上引领蹊径的政治导师。日后的维新骨干中，不少人是出自这所不寻常的“草堂”。至于康有为这期间在弟子们协助下锻造成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，当然要算《新学伪经考》和《孔子改制考》（前者于光绪十七年问世，后者迟至光绪二十四年才刊出）：一则釜底抽薪般地把传统上奉为神圣的古文经典，一下子“考证”为“伪经”；一则把灵光熠熠的“至圣先师”孔老夫子，冷不丁改扮成了进化改制的鼻祖。这一破一立之间，玩了一个多么玄妙的政治魔术！而所凭借的，却是一副“学术”的道具。即使我们今天看来也该叹服，这位康先生真是一位借学言政的高手！

康有为又绝不惮于不失时机直截了当地亮政治牌。更为人熟知的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他所领导的“公车上书”，便是很典型的一局。此前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，康有为再次参加乡试获中举人，次年他与梁启超一起赴京会试（这次是慈禧太后六旬万寿恩科。此前梁启超已参加过会试未中），双双落榜，来年再举（正科）之际，便有了“公车上书”事情的发生。

对于中华民族来说，这是个创巨痛深而又空前惊醒的年头。严重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签订的噩耗，刺激一切有痛感、有良知的国人发出挽危救亡的呼号，而“公车上书”，便是这中间的最强音，同时也是最富理性的声音。由康有为用一昼两夜亲自拟成的洋洋洒洒一万四千余言的“书”稿，不只是对国难当头的哀痛和悲愤的宣泄，而且提出了一套变法维新的方案：一要“下诏鼓天下之气”，二要“迁都定天下之本”，三要“练兵强天下之势”，四要“变法成天下之治”。在他看来，前三项是“权宜应敌之谋”，后一项则为最根本的“立国自强之策”。他又提出变法着重在富国、养民、教民三个方面，每个方面都列出了若干具体措施。

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的惊动了京城，顽固守旧大臣们气急败坏，

他们大肆攻击康有为蛊惑人心，乱政乱法，并在应试举人们中间进行反宣传，甚至公然进行恫吓，以致最后实际签名者仅六百余人。负有呈递下面上书之责的都察院以朝廷已在《马关条约》上用宝（盖印），事已成定局，无可更易，拒绝接受上书，皇帝当然也就未能看到。不过，上书之事以及书之内容在朝野上下纷纷传论，真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。

上书被格，但康有为在这次会试中报捷，中了进士。正考官徐桐，作为守旧派的典型人物，自然对康有为非常忌恨并欲极力压制。据说因为康有为在这次应试中故意大变文风，以致存心格之的徐桐未能识得其卷，而本已得副考官李文田激赏的梁启超卷，反被徐桐看出有背绳尺之处，疑为康卷，遂扼而不录。揭封后，才明了康得中而梁未中的事实，但正副考官还是联同尽量压低康的中式名次。

康有为中进士后被授职工部主事，他不愿做一介供人驱使的小吏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，故不到署，继续从事他的维新变法活动。在公车上书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，他又第三次、第四次上书（公车上书因是由康有为策动、领导并亲自拟稿的，故被视为他的第二次上书）。第三次上书被呈递到光绪皇帝手中，康有为的变法呼吁和筹策受到皇帝重视。第四次上书“言变法曲折之故，凡万余言，尤详尽矣”，特别是正式提出了“设议院以通下情”的主张，更属一大亮点。但这次上书又受到顽固派大臣的刁难，几经辗转，终无人肯代呈，因此未能上达皇帝。

如果把“公车上书”作为维新运动正式开场的标志，那么，在此之后，迅速形成学会林立、报刊盛行的局面，则显现出运动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。在这中间，康有为是无形的灵魂，有形的旗帜。然而，维新运动发展可谓一波三折，康有为了当年秋出京，辗转到南京、上海活动，建会办报，北京的形势却逐渐恶化，在顽固派的压制和破坏下，维新运动潮头回落，南方也很快受到影响，康有为又回到广东相机行事。

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冬间，发生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强占胶州湾的恶性事件，列强拉开群起效尤在华强占“租借地”的架式，康有为敏感地觉察到形势的严峻，放下正在筹划的向巴西移民以削减中国人满之患

的所谓“开辟新国”的事宜，由上海到北京举第五次上书之事。时在这年的十二月，按公历已到了1898年1月。此次上书开宗明义地宣示，是“为外衅危迫，分割洵至，急宜及时发愤，革旧图新，以少存国祚”之由。痛切陈述，自己因隐忧时事而屡次上书请求变法，但“侧望新政，而泄沓如故”，“昔时忧危之论，仓猝遽验于目前”，“瓜分豆剖，渐露机牙”，不得不再诣阙廷上书。书中有这样一段言论：

二万万膏腴之地，四万万秀淑之民，诸国耽耽，朵颐已久，慢藏诲盗，陈之交衢，主者屡经抢掠，高卧不醒，守者袖手熟视，若病青狂，唾手可得，俯拾即是，如蚁慕膻，闻风并至，失鹿共逐，抚掌欢呼。其始壮夫动其食指，其后老稚亦分杯羹，诸国咸来，并思一啖。昔者安南之役（按：指中法战争），十年乃有东事（按：指甲午战争），割台之后，两载遂有胶州，中间东三省、龙州之铁路，滇粤之矿，土司野人山之边疆，尚不计矣。自尔以后，赴机愈急，蓄势益紧，事变之来，日迫一日。教堂遍地，无刻不可起衅，矿产遍地，无处不可要求。骨肉有限，剥削无已。且铁路与人，南北之咽喉已绝；疆臣斥逐，用人之大权亦失……蚁穴溃堤，衅不在大。职恐自尔之后，皇上与诸臣，虽欲苟安旦夕、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，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。

鉴此，康有为提出了变法挽救之三策：一是“采法俄日以定国是”，二是“大集群才而谋变政”，三是“听任疆臣各自变法”。尤其是言及“国事付国会议行”，“采择万国律例，定宪法公私之分”。

康有为虽未实际就任工部主事，但既为朝廷任命，挂名其职名正言顺，他上书即以工部主事的名义。按例，下属的上书可由有奏事权的本部堂官代奏。当时工部尚书为崧淮，他对康有为主书“恶其伉直”，甚至于“大怒”而“不肯代奏”。然而，康氏的这份书稿广泛传抄开来，甚至刊刻流行，为臣工士人所多见，许多人都为之嗟悚。有个叫高燮曾的人，居官给事中，

不知真的被康有为的书稿打动，还是由于其他原因（如或说为人策使，或疑为康购买），他上奏弹劾淞淮愚昧昏聩，不谙形势，压制部属，阻格言路，而盛赞康有为忠君爱国，谙于西法，才堪大用，请求皇上予以破格召见，委以重任。

康有为几年来大力为维新呼号奔走，声播全国，名动京师，光绪皇帝对他自然有所了解，何况在屡次上书当中，还有上达这位皇帝手中的呢？破除顽固守旧大臣们设置的障碍，直接听取康有为的建言，是这位皇帝所希望的，高燮曾的疏荐，正合他的心意，遂决定召见康有为。可光绪皇帝并不是一个能唯己所愿畅行无阻的君主，他受着从太后到权臣的重重掣肘。这不，听说皇帝竟要召见康有为，恭亲王奕訢出面干涉了。他说，本朝成例，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，今康有为乃小臣，皇帝若欲有所询问，命王大臣传语可也。也就是说，需由王大臣接见康有为向皇上转达他的意见。光绪皇帝不得已，只好依从。于是，便有了眼下西花厅里“大臣”接见“小臣”的一幕。

恭亲王奕訢作为总理衙门的主持者，并没有出面接见康有为，莫不是他觉得自己作为堂堂王爷，亲自出面与康有为这么个“小臣”谈话有失身份？当然，他尽可以托故有其他公干，据说，当天他与庆亲王奕劻有陪同英俄两国公使的外事活动。至于这次接见由总理衙门具体铺排，不但是因为康有为的建言由外患激发，事涉外国，而且当时总理衙门职能宽泛得俨然实际上的“内阁”。

出面接见康有为的几个大臣，对接见康氏的存心和立场、态度也颇不一致。

荣禄，作为有协办大学士荣衔、担任兵部尚书的要员，是慈禧太后的党羽，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变法的立场上，对于主旨即在阐扬变法的康有为，试图来个下马威，恶狠狠地强调：“祖宗之法不能变！”

康有为立即针锋相对地回击：“祖宗之法，是用以治理祖宗土地的，如今祖宗的土地都不能保守了，还谈得上什么祖宗之法呢？就像总理衙门这个地方，也不是祖宗之法所有的呀，因时制宜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。”